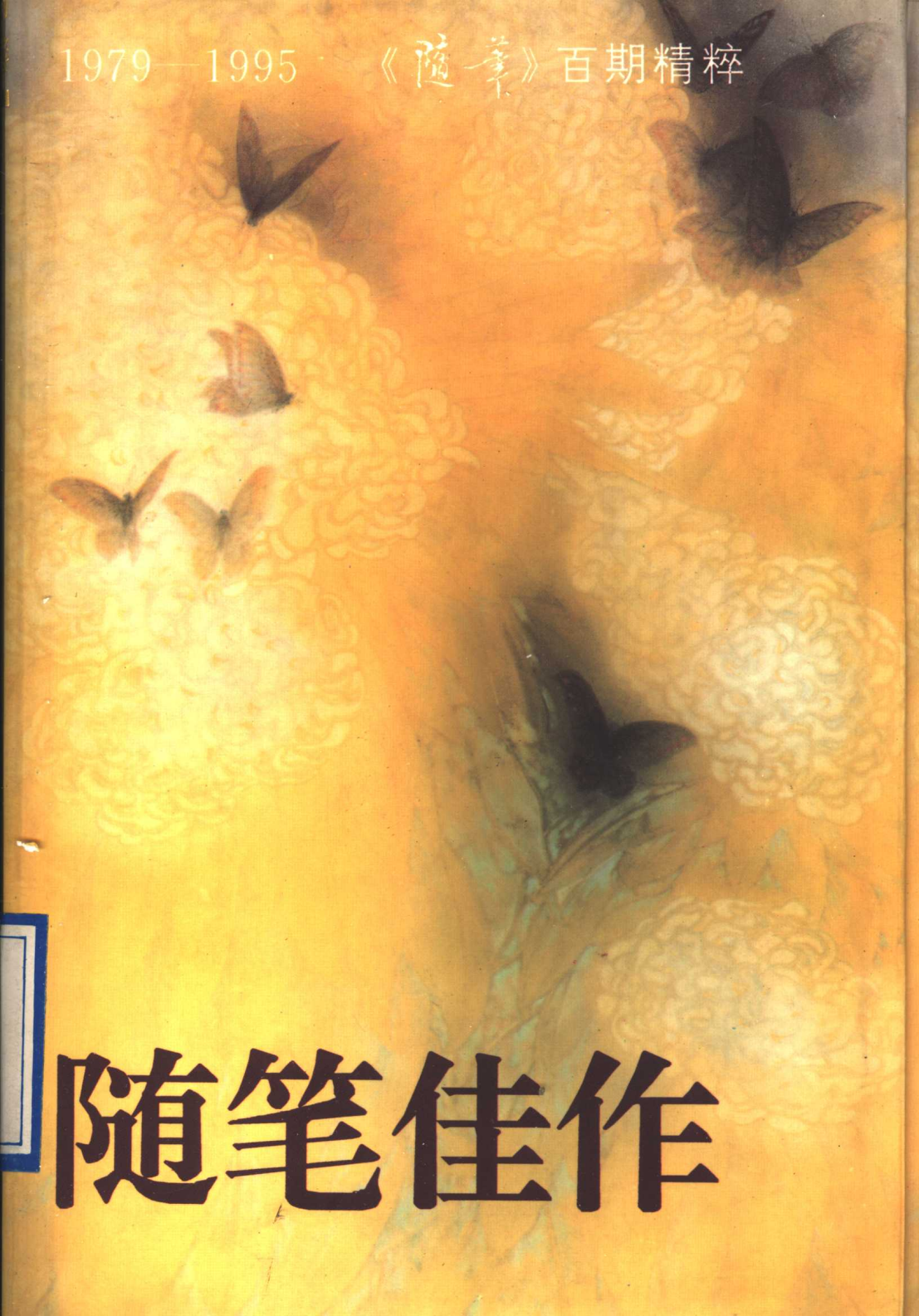


1979—1995

《随·筆》百期精粹



随笔佳作

1979—1995

《随笔》百期精粹

道
笔
佳
作

编选

《随笔》杂志社

主编

杜渐坤

下

花城出版社

随 笔 佳 作

——《随笔》百期精粹（1979—1995）

主编 杜渐坤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中 山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广东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0.5 印张 6 插页 1,160,000 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60-2204-2

I·1895 上、下册定价：7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下 册 目 录

1993 年

(总第 84—89 期)

- | | | | |
|---------|------------|---------|-------------------------|
| 607 屠 岸 | “哪见风吹花上枝?” | 674 汪曾祺 | 昆明的吃食 |
| 610 蓝 翎 | 沉寂中的呼唤 | 681 杜 宣 | 重访茅崎 |
| 619 张 洁 | 母亲的厨房 | 685 姜德明 | 笑声泪痕 |
| 626 邵燕祥 | 生死两荆轲 | 688 张中行 | 酒 |
| 629 李国文 | 大观园分房记 | 696 叶 楠 | 无梦时节 |
| 634 徐 刚 | 寒云去不还 | 699 杨羽仪 | 选坟 |
| | ——读史随笔 | 703 刘 征 | 忧天赘语 |
| 638 李书崇 | 捂着鼻子说东邻 | 705 张国擎 | 禁狗 |
| | ——读福泽谕吉 | 709 冯骥才 | 表白的快意 |
| 644 和 谷 | 客岛札记 | | ——画集《心灵的
自白》自序 |
| 648 周 涛 | 大雪飘、饺子包 | 711 徐中玉 | 中外文学随谈 |
| 650 刘心武 | 心里难过 | 715 王安忆 | 港岛拾遗 |
| 653 李国文 | 挨骂的艺术 | 719 李国文 | 刁奴与恶主之间 |
| 657 于光远 | 病中杂感(九则) | 724 李育中 | 一个外国人笔下的
梁漱溟 |
| 665 陈祖芬 | 亲密的尴尬 | | ——写在梁漱溟先
生诞辰一百
周年 |
| 667 何满子 | 皇帝与文人 | 729 黄宗江 | 能不忆青岛 |
| 671 湛 容 | 更多的意思 | | |

- 733 舒 展 美石城玄想(外一篇)
- 738 耿 庸 记傅东华
- 746 吴祖光 撞车记
- 751 叶君健 重返书房
- 755 徐 慧 广告大海洋
- 759 张 镏 冰心二题
- 768 邵燕祥 女沙皇和大学者
——夜读抄
- 774 白 桦 梦里不知身是客
- 777 董乐山 愿者上钩
- 780 公 刘 拜金狂潮与作家心
态(外一篇)
- 786 傅孝先 别样情怀
- 1994 年
(总第 90—95 期)
- 789 张中行 才女·小说·实境
- 795 白 桦 在辉煌之外的灯影
里
- 798 伍立杨 强歌声不欢(外一篇)
- 803 忆明珠 丁香小语
- 813 池 莉 李斯新举措
- 816 绿 原 迷信种种(上)
- 823 苏 苹 女人与酒
- 825 林斤澜 门?
- 829 吴祖光 半夜跌交记
- 833 黎 军 他(她)是被遗忘还
是应忘却
- 837 从维熙 想起了《骠骑兵》
——假如巴尔扎克
还活着
- 840 金克木 一梦三千年
- 844 邵燕祥 马克思讽刺小拿破
仑
- 848 李国文 空心大老
- 854 绿 原 迷信种种(下)
- 861 司马一匀 说侠气
- 863 范 用 邂逅
- 869 叶 楠 物质和精神的搏斗
——匈牙利散记之
四
- 874 董乐山 镀金的辉煌
- 877 高晓声 那边半本戏
- 880 田中禾 高雅而潇洒的遁逃
- 884 傅惟慈 从美国对早老性痴
呆症的研究到中国
人的健忘症
- 888 李公明 岑寂与风雪的俄罗
斯
- 892 程乃珊 关于《走出非洲》之
外
- 895 洁 泯 漫说认真
- 897 冀 沅 病中读史
- 903 王水照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
- 907 金克木 荒诞颜回传
- 911 陈丹晨 厚殓·祭祀·谥号
- 917 吕 剑 照片
- 921 舒 婷 小气的男人与撒谎
的女人
- 925 方 方 和平日子的恐惧
- 932 韩作荣 一唱三叹

937 朱厚泽 为了孩子

940 叶楠 蓝色的梦

——纪念甲午战争

百年

945 陈荒煤 “职业杀手”与“信息高速公路”

949 邵燕祥 一个独特的话题
(外二篇)

956 姜滇 满街是狗(外一篇)

960 周树山 你失落了还是未曾有过

965 唐达成 头发的悲喜剧

968 艾煊 空空实实之居

974 叶文玲 去往墓地的路上
——母亲周年祭

978 陈四益 一本可怕的书
——乱翻书之五

989 唐达成 大勇者的风度

993 牧惠 陈东的血痕

997 何满子 漫说宗教忏悔礼

1000 陈村 一个舞蹈和他的几个背景

1004 梅汝恺 白杨悲风忆故人

1012 苏叶 锦瑟无弦

1015 贾宝泉 许愿

1020 温远辉 博尔赫斯:隐于时间的神秘暗号

1024 方成 为韩羽《杂烩集》序

1995 年

(总第 96—100 期)

1026 叶楠 危机迫在眉睫

1031 陈少华 克尔凯戈尔:
困难的现代主义

1035 刘绪源 门外三谈

1043 赵丽宏 回忆音乐

1048 费振钟 明朝文人的谐谑

1058 谢友鄞 满街寂寞

1061 潘旭澜 惊起却回头

1064 端木蕻良 随想

1066 李元洛 话说“方城之战”

1070 公刘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眉批摘抄

1072 周翼南 谈楼层

1076 韩石山 生次自己的病(外一篇)

1080 凸凹 文坛二老

1086 黄天骥 护身符

1091 刘湛秋 辉煌而潇洒地度过一生

——关于普希金和他的诗

1099 袁鹰 江河湖海会记住他

——送夏公南归

1105 王蒙 文学与世界

1109 筱敏 草叶的背面

1113 王久辛 绿风诗札

- | | | | | | |
|------|-----|--------------|------|----------------|--------------|
| 1116 | 艾 煊 | 神兽的烦恼(外二篇) | 1178 | 李国文 | 论贾环 |
| 1124 | 徐 刚 | 旧岁感觉 | 1185 | 忆明珠 | 小品六则 |
| 1128 | 沙叶新 | 说真话何需勇气 | 1196 | 严 秀 | 续貂八则 |
| 1131 | 伊 丽 | 生病 | | | ——也谈“不读”问题 |
| 1135 | 许 淇 | 江南忆·风景旧曾谙 | 1200 | 邓友梅 | 漫说林斤澜 |
| 1140 | 张长弓 | 山野的清香 | 1206 | 梁晓声 | 答X小姐问 |
| 1144 | 魏荒弩 | 山居杂记 | | | ——一个中国作家的备忘录 |
| | | ——怀陈德清老人 | 1214 | 陈 村 | 活在今天 |
| 1148 | 阎 纲 | 斯人独憔悴 | 1218 | 何满子 | “后国学”虚脱症 |
| 1155 | 萧 乾 | 混世魔王希特勒 | 1222 | 韩 羽 | 杭州三日 |
| | | ——二战史话 | 1225 | 王为政 | 方言古语 |
| 1159 | 流沙河 | 蜻蜓不再飞回来(外一篇) | 1231 | 《随笔》1—100期目录索引 | |
| 1162 | 刘心武 | 虽然我不喜欢 | | | |
| 1166 | 戴厚英 | 结缘雪窦寺 | | | |

道/你的眼睛，来观赏你的额角：/赞美你每一只乳房，花两百年光阴，/再用三万年来赞美你其他的部分；/每一部分至少花一整个时代，/到最后时代才说出你的心来。”然后笔锋一转：“但是，在我背后我永远听到/时间的飞车正在急急地来到。”“将来，在你的大理石墓穴里也永远不会/再响起我的恋歌的回音。”“坟墓这地方确是隐秘而美好，/但我想总不会有人在那儿拥抱。”这位“玄学派”诗人以异想天开的构思，出奇制胜，惊世骇俗，取得了“轰动效应”。看来，“莫负好时光”的主题，还可以如此这般地花样翻新。正如莎翁十四行诗第七十六首中所说的：“我要竭尽全力从旧词出新意，/把已经说过的事情再说几遍。”只要能“出新意”，“已经说过的”“旧词”就会放射出新的艺术魅力来。

一天，我的老友、戏剧评论家张真示我以一首广西民歌手刘三妹的情歌：

妹相思，
不作相思到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
哪见风吹花上枝？

张真和我极赞这首歌的佳妙。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同《搦梅》和《金缕衣》相媲美，也可与上述莎翁及英国那几位诗人的作品相颉颃，因为它有自己的艺术特色。这首歌有形象，有意象，有只有民歌手才能想象出来的意象。这里也出现了“花”，但刘三妹出手不凡：这里的花借助风而出现两种情态，一是枝上之花被吹落地，一是落地之花被吹上枝；前者是恒久常见的现实，后者是永无可能的幻想。一落一上，有深意存焉。而这里的“风”实是“时间”的化身，或者是时间的拟人化。这首歌寓警策于诙谐，含深邃于质朴，读（听）后令人惊喜交加，转而进入沉思。这种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的、突梯而又美妙的比喻，真是锦心绣口的创造，活脱脱表现出刘三妹的绝顶聪明和美丽！这首歌的字数比上述各诗都要少，但它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一点点浓

缩铀蕴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这首歌别出心裁，化平凡为神奇，令人一听即终生难忘。江青的“民歌淫荡”论滚到茅厕里去吧！这样的歌是真正了不起的天才之作！

《妹相思》是纯正无邪的爱情的歌唱。但善于举一反三的聪明读者会感到这首歌的思想涵盖面相当宽广。“作相思”要不失时机，那么学习、锻炼、工作不是也应分秒必争吗？政治运动，外交斗争，经济建设，都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的国家在向现代化的进军中已经丢失过多少时机，现在不能再丢失了。落花重上枝头，谁见来？“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的，但是一定要“过河”，不能老是“摸着石头”踟蹰不前呵！

1992年8月

选自1993年1期

沉寂中的呼唤

蓝 翎

1949年7月，建国前不久，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来自原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于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革命的人民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文学史家所说的“当代文学”的时期。建国后的两三年内，国家虽然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但新的人民文艺却呈现出充满生机的蓬勃向上的局面，各种文学样式不断出现好作品，文学新人也不断出现。然而，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杂文，同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却显得相对的沉寂。当然，这不意味着没有杂文。建国后的几天内，老作家胡风就接连写了两篇纪念鲁迅的杂文《鲁迅还活着》和《不死的青春》（《胡风杂文集》）。1950年，秦似写了北京改造妓女的《法源寺内》。当时仍滞留香港的老作家聂绀弩，写了《论黄色文化》，谈北京查封妓院的《茫然》，以及外交题材的《关于伍修权将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当时在武汉的陈笑雨、张铁夫和郭小川，共用集体笔名马铁丁（1952年以后，此笔名则为陈笑雨一人专署），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主要发表在《长江日报》上，成为建国后第一个作家集体专栏。文章如促膝谈心、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很少有板起面孔训人的“八股腔”，读者易于接受，在当时影响很大。

尽管有了上述一些好杂文，但是，从全国报刊上看，还是显得太少了，特别是缺乏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倡导，不知是出于直感还是经过了深思，面对这相对沉寂的现象，上海的作家黄裳同志不耐沉寂，

于1950年4月4日《文汇报》上发出第一声呼唤：《杂文复兴》。这篇短文的主旨明白了当：“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曾经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意即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杂文。这种杂文，在新时代“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目的是纠正过失、改善工作的现状，这和对敌人的无情的打击是有着根本的差异的”。作者也谈到，“跟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型（形）式自然得变”，写得让人民大众更容易看懂；又“必须防止”“冲淡了斗争情绪”的流弊。“要复兴杂文，就必须站稳了立场，抓住了论点的积极性和建设性，不要流于‘谈话’，人民大众是不要听谈话的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革命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让杂文充当在人民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对。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杂文时说过：“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以此衡量，黄裳的文章论点完全可以站得住、站得稳，是有的放矢，不是想当然的空谈。而且，我现在还这样想，黄裳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在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能敏感到杂文的沉寂现象，在一则千字文内谈得那么准确、全面，的确不简单。可惜，黄裳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相反，由此而引发出来的一些文章，除了个别的，基本上都不赞成黄裳的观点，不同意提倡“杂文复兴”。两个月后，老作家冯雪峰写了总结性的长篇论文《谈谈杂文》（《雪峰文集》〈2〉），讨论就此结束。

《谈谈杂文》开门见山：“现在有不少的人，提起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杂文呢？我觉得，我们能够肯定地回答：我们今天是需要杂文的，而且非常需要杂文的。不过，问题却又在：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杂文呢？就是说，怎样的杂文，才是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才能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必要的、很好的工具？”作者认为，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杂文现在也不很发达，这证明对于杂文的观念还有些混乱，毛主席的指示也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深刻

地引起注意”。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即“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为此，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如何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关于杂文的指示，如何全面地理解鲁迅的杂文，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写好杂文。“在今天，人民需要的是新的革命的杂文，也就是说，人民正需要杂文，正需要新的革命的杂文。为着巩固和完成人民民主专政，为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为着肃清帝国主义所留下的影响和反对它的新阴谋并保卫世界和平，为着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和一切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与思想余毒，为着团结人民和发扬人民创造力与劳动热情，杂文是有它用武之地的。”应该说，这是建国后很有分量的一篇研究杂文的理论文章，尤其是发表在当年第二卷第九期的《文艺报》上，面向全国，是在更大范围内对“杂文复兴”的呼唤。但是，很遗憾，作者在分析“不少的人”对杂文的“一种偏见和狭隘的心情”时，有些文字就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比如说，“他们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他们以为不谈杂文则已，要谈杂文，就只有鲁迅的杂文，或只有鲁迅那样的杂文，才能算是杂文的”，就是一种“偏见”。这种看法，是不是一种“偏见”，当然可以讨论，这是鲁迅研究中常见的问题。然而，把这种看法归结为“又一定不得和一种狭隘的、不健康的心情相结在一起的”。而怀有“这种偏见和心情”的人，“就是由于不能跟时代前进，而和人民群众有很大距离，这才产生这种偏见和这种心情的。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最后的挣扎”。“这是有害的形式主义的偏见，是一种反人民的态度。”言重了！这些都是很伤感情的话，特别是对于作家。黄裳提出“杂文复兴”的问题，是出于“这种偏见和这种心情”吗？黄裳不也说得明白吗？“过去说话绕弯子，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还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在它的锋锐，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鲁迅先生的成就，就是这样。”这同冯雪峰对鲁迅的看法倒是颇为一致的。我不敢说当时不可能有对鲁迅的杂文持这种“偏见”的人，把鲁迅笔法简单归纳为“隐晦曲折”，即使三十年后，“新基调”杂文理论的创造者，就还是这样贬低鲁迅笔法为“隐晦曲折”的。所以，尽管冯雪峰

满怀激情地呼唤新的革命杂文和杂文家的出现,但这个大前提一摆,怕是有人不敢向前了。冯雪峰也是杂文史上的大家,有《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文集,既有杂文创作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可是,他自己只在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歌颂新人物的《杂感》,再也没有写杂文,就接连不断地大难临头,连只有一篇写于建国后而其余都是写于建国前的《雪峰寓言》集,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写寓言尚且如此,可见写杂文也不那么容易。呼唤尽管呼唤,杂文园地依然沉寂。时机不到,个人的呼声是渺小的,不论是大作家或者不大的作家。

当然,谈论任何文学问题,都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对,一绝对,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何况一种文体的变化也得有个过程,不能像一个城市的解放那样,一夜之间就截然两样。单纯的呼唤,如果得不到广泛的共识和赞同,作家不拿起笔来进行积极的创作实践,那沉寂中的回响也必然十分微弱。定出过高的标准,作家惟恐达不到而不积极实践,目标也会落空。历史经验证明,先不要摆出一系列高不可攀的大前提,大胆地热情地鼓励作家拿起笔来实践,如果在实践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再具体地进行讨论,研究解决,那就比坐而论道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样的成功经验是有的,当事人三十年后才把这秘密的经验公之于众,可惜为时太晚了。

也就是在这次“杂文复兴”的讨论之前不久,有一则关于杂文的“保密”趣话。夏公(衍)1982年10月29日写的“敬向《新民晚报》的读者恭贺新禧”的《迎新忆旧》一文,其中忆到了这则趣话:

“……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林放)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

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忙，二是‘密’保不住，渐渐传开了。有人讲怪话，就主动收摊了。”

（《夏衍选集》第四卷，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前面相对照，黄裳的文章仅仅是呼唤，冯雪峰的文章是有所设防的呼唤，陈毅的谈话是不设防的鼓励、支持和保护。哪一种作法更有成效呢？当然是后者。这不仅仅因为陈毅是当时上海和华东行政区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对繁荣杂文以及文艺创作的胆识、远见和策略。正因为有陈毅的支持，夏公才能在百废待兴的繁忙之余写了百多篇专栏文章，成了建国之初成绩最多的杂文作家，而马铁丁的出现和为人所知还在此后。仅以《夏衍选集》第四卷所选的三十四篇《灯下闲话》而论，虽然时过四十余年，直到今天，读起来仍感新鲜，所言中的。如《民心的指标》、《好社论，好文风》、《论恭维》、《报喜与报忧》、《谈自我批评》、《朋友与同志》、《关于误“植”》、《又谈开会》、《老实一点吧》、《也谈服饰》等，不少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杂文，还重复谈论着其中的若干问题，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当然，夏公所得到的这种殊遇，一般作家碰不到。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主动收摊了”，原因之一是“有人讲怪话”。什么“怪话”？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不利于杂文创作的，是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否则的话，他不一定“收摊”，也不会到1954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谈小品文》，再次呼唤杂文了。几十年间，夏公不断呼唤，不断创作，屡遭大难，不改初衷，这才是最值得钦敬的坚持真理的老一代杂文家的风骨。

“杂文复兴”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引起杂文的复兴，换句话说，是没有积极效果的讨论，理论落空了。1951年至1952年间，除了马铁丁的杂文，很少看到其他作家较为有影响的杂文发表。是丧失了写杂文的能力，还是有所顾虑？这可能同对杂文的社会批评功能的理解有关。其实，马铁丁的不少杂文也是具有社会批评功能的特点的，如对知识分子旧思想的批评等等，受到的是称赞，很少“有人讲怪话”，正如当时

被肯定的一部表现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话剧《思想问题》那样。而夏公的批评层次较深，如《论恭维》说：“连耆老们也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这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但是我的意思，却以为每逢听到人家恭维或赞扬的时候，必须先把人家赞扬的事情再好好的反省一遍，检阅一下，看一看一般人所欢迎的、赞成的、心悦诚服的那些特点，我们是不是已经真真不折不扣的、和人家所颂扬一般地做到了？假如做到了，那么这是本分，立志为人民服务的人做到这样是应该的，必须的，不值得特别赞扬的。反过来说，假如还没有做到，或者差得很远，那么我们就必须及时警惕，加紧努力，以符合人民的愿望。”“古人说过‘闻过则喜’的话，这就是要我们诚恳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地要求‘闻过则思’，这并不是矫情，而是叫我们不要陶醉于人们的捧场赞颂之中，而松懈了自己的努力。”在胜利面前，在赞扬声中，这是多么富有理智的清醒头脑、严于律己的自我解剖和深谋远虑的胸怀！而在胜利面前和赞扬声中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甚至居功自傲的人，对于这样的忠告就未必能听得进去，甚至觉得刺耳，因之“讲怪话”也不足怪，以后杂文发展的遭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言犹其未尽，又换另一笔名将此文同《人民日报》上《评各地报纸的读者服务版》相联系，写成《报喜与报忧》一文，进一步申说“这两者不仅同样地都强调着批评的重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可忧的现实，这是现在发表在报纸上的消息、论文、通讯、乃至读者来函，依旧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在大喜事的后面，就没有严重的值得忧虑的事象存在了么？……干部执行政策的偏差，官僚主义的严重，乃至本位主义，麻痹浪费，不爱惜人民财产等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不都是值得我们及时向负责方面反映的可忧虑的现实么？老百姓有话无处说，或者不敢说，负有舆论之责的新闻记者就得勇敢地把个责任负起来，报喜鼓舞人民的信心，报忧唤起干部的警惕。只有这样，才能上下沟通，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当然……一切报导和揭发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可以这样说，“报喜不报忧”是报纸几十年来屡提而屡不能彻底改变的老毛病。我想，这个要求，不仅新闻记者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来，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

特别是杂文作家，同样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来。因此，那种要求杂文只歌颂而不批评的所谓新“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可忧现象，它要求作家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起眼睛，实际上是给历史的发展帮倒忙，庇护了一切阻碍历史发展的落后现象，直接违背了1950年4月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

不仅夏公，站在人民群众中间，面对现实生活，勇敢地担负起社会批评的杂文家还是有的，尽管不是很多。曾彦修（严秀）于1953年5月在广州写了有名的《论“数蚊子”》，尖锐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在不久以前，中央有一个部，曾用一个大得可怕的名义，发了一个指示给全国，说过去卫生运动中各地所消灭的蚊蝇等等的统计单位不‘科学’，今后在统计这项数字时，要各地以‘科学’的单位计算，‘蚊、蝇、孑孓、蝇蛹等一律要以个数计。’”作者认为，“这很像一个技术高超的人编选出来的笑话，也很像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谈”。“请问发指示的人：府上喷射‘滴滴涕’时，你是如何‘科学’地统计你所消灭的蚊蝇的‘个数’的？还有，在水里消灭多少‘孑孓’，你又有什么‘科学’方法可以统计它的‘个数’呢？……按照这个指示，把全国人民一个不漏地全部动员起来，百事不干专门去做‘数蚊子’的工作也完不成任务呀！”“这种事情为什么竟能从起草人一级一级地批上去，又一级一级地批下来，堂而皇之地流毒全国呢？这就说明官僚主义的毛病在我们的不少机构里已经如何地浸透了，病情严重，以至有些病人是已经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了。”“让我们对‘数蚊子’这样的‘创作’像消灭苍蝇蚊子一样用共产党人的原则性、明确性把它们彻底消灭吧！”

面对现实矛盾，作家基于对生活的强烈感受，自己文章的视角也在变，突出的例子之一是郭小川。郭小川是诗人，也是杂文家，马铁丁三人集体之一，写过大量“思想杂谈”。1953年，他不再用集体笔名写了较长的杂文《论“听话”》，从大量的生活现象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如何从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听话”问题，以纠正正在教育青少年中的对这个问题的偏颇理解。作家将普遍存在的大

量现象归结为几种类型进行分析：“好团员=团籍+‘听话’；好学生=学籍+‘听话’。好青年=青年+‘听话’；好孩子=孩子+‘听话’。总之，‘好者’，‘听话’也。听话成为唯一准绳。”作者认为，此种教育青少年“听话”之偏颇作法其弊有三：“第一，它不问这‘话’是什么样的‘话’，是正确的‘话’，还是错误的‘话’。……第二，它不是提倡让孩子和青年去做独立思考的评判，而是叫他们盲目地去‘听’。……第三，它不是发扬孩子和青年的创造性，而是教他们墨守成规。”作者经过分析阐述，认为代替此种偏颇作法的，应“是两种根本的为人态度：一是服从真理的精神；二是创造精神”。这篇文章，比之他们过去所写的一些教育青少年的“思想杂谈”，内容更为深广，用现在流行词儿来说，是作者的“自我超越”。不知是作者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涉及，其实那几种“好”的公式，都只不过是派生物，其根源应是“好党员=党籍+‘听话’”，如果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前者，因为团员正是党的后备军，这就触及到党员教育中的“驯服工具论”，是不好随便谈论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认识和解决，前面所谈的那些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郭小川的这篇杂文，而是在肯定其独创性、深刻性和新鲜感的前提下，来探讨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杂文家的笔永远也写不完，探索不尽，否则什么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就“止于至善”，历史还会发展吗？还需要不断探索真理和发挥独创精神吗？

有些靠吃政治运动饭的“批判家”，一遇到适当的时机，就“勇敢”地先把目光对准写批评性杂文的作家，大抓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太熟悉当代报刊的情况，经过多次政治运动，还有始终没有被他们抓着的。1953年末，《人民日报》忽然集中地发了一批杂文（十月份的《人民日报·索引》用的是“杂文”之名，十二月份则用“小品文”之名，但同下一年的“小品文”含义有别）。几位作家用笔名轮流出场。马铁丁（陈笑雨）写了《什么叫带头》、《出发到哪里？》、《农民立场》、《驳“农民落后论”》、《更下一层》；丁三（林淡秋）写了《用新眼光看新事物》、《从“文官不爱钱”说起》、《关于“人力积压”》、《“石头旅行”》、《哄吓骗都不行了》；马前卒（巴人）写